

# 跨文化交流与文化误读

## —以17-18世纪中韩文人的交流为中心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Misunderstanding:  
Focus on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18th century

牛 林杰·李 学堂

### [论文摘要]

跨文化交际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理论体系尚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跨文化交际的历史却很久远，这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前近代东亚三国的文化交流和表象”实际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近代东亚三国文人之间的交际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中日韩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为三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三国的文人可以很容易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但东亚三国又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也会出现一些文化误读(Misunderstand)现象。

近年来，中国学界已经开始对各个历史时期中韩文人之间的交流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大都是围绕着朝鲜文人如何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作者的创作目标、审美观、表现形式等的形成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的影响，而更取决于生活环境和文化底蕴的差异。因此，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也许更有利于正确理解两国文学关系的本质。

17-18世纪是中韩文人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朝鲜文人通过“使行”与中国文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有的甚至代代相传。其中比较典型有朝鲜安东金尚宪（号清阴，1570~1652）与渔洋王士禛之间的世交和丰山洪良浩（号耳溪，1724~1802）家族与纪昀向家族的交往。透过金氏家族与张延登、王士禛的交流以及洪良浩与纪昀的交流关系，不难看出两国间文学的交流是建立在文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这种交流不但丝毫没有因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障碍而逊色，反而更加感人至深，而且持续时间长久。中原文士张延登、王士禛以及纪昀对朝鲜文人诗文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同时也反映了两国文人之间在人生观与审美观上的共同取向。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代表了中原文化与朝鲜文化之间的文化交融。两国文化的共同性使得两国文人都体会了一种文化认同感。

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即便是在交通、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着语言、文化等很多方面的障碍。而在17-18世纪的中国和朝鲜，两国文人却能够建立起密切

的交流关系，并留下了许多曲折动人的传世佳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韩两国相似的文化背景在两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两国学者对儒家文化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在人生观、文学观、伦理观、世界观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使得两国文人很容易亲近，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第二，两国文人共同的交流工具—汉字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尽管两国文人的语言不通，但他们都可以使用汉字进行“笔谈”，这就大大方便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笔谈”还有利于准确记录他们所谈的内容，有利于建立长久的交流关系。第三，汉诗是中韩两国文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中韩两国的文人皆能文善诗，而中国自古就有“以诗会友”的传统。两国文人的相识和交流大多都是从诵读和评论对方的汉诗开始的，文人之间相互交流诗作成为他们日常交往的重要内容。第四，学术切磋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文人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中韩两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仅限于表面上的礼节性交往，而且涉及到了深层次的学术探讨，甚至批评和争论。

当然，两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也无法避免地发生对方文化的误读现象。避免误读是促进两种文化进行正常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有一种富于理解的心态，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同时本国学者也有必要主动地把本国文化准确地介绍给对方。17-18世纪中韩之间出现的文化误读大多数都是由于缺乏沟通和了解而产生的无意识的误读。两国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消除两国文人之间的文化误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正是由于两国历代文人的积极努力，中韩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因为文化误读而引起的文化冲突现象。

## 1、引言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我们的生活随着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使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们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即产生出许多所谓“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机会。交流未必总意味着友好，在相互交流中也会出现一些文化误读（Misunderstanding）甚至文化冲突现象。只有不断地加深互相之间的了解，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而对不同文化之间如何达到相互沟通的理论研究正是“跨文化交流”研究的目的。

跨文化交流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理论体系尚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却很久远。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有历史记载的古朝鲜，一直到朝鲜后期，有关两国文人交流的记载不胜枚举。近年来，韩国学界经数十年努力整理而成的数量庞大的《韩国文集丛刊》就涉及到很多中韩文化交流的内容。这些文集的作者大都是各个朝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他们在文集中大量记录了对四书五经的学习心得，对宋明理学的探讨，对各个时期中国文学流派的批评解读以及和中国

文人的直接交流情况等等。

《韩国文集丛刊》的发行，为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近年来，中国学界已经开始对各个历史时期中韩文人之间的交流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sup>1</sup>。但不容否认的是，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大都是围绕着朝鲜文人如何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作者的创作目标、审美观、表现形式等的形成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的影响，而更取决于生活环境和文化底蕴的差异。所以，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也许更有利于正确理解两国文学关系的本质。本文拟以17-18世纪中韩文人之间的交流为中心，考察东亚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中韩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 2、17-18世纪中韩文人的交流

17-18世纪是中韩文人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朝鲜文人通过“使行”与中国文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有的甚至代代相传。其中比较典型有朝鲜安东金尚宪（号清阴，1570~1652）与渔洋王士禛之间的世交和丰山洪良浩（号耳溪，1724~1802）与纪昀的交往。此外，还有北学派洪大容及朴趾源、李德懋等与清朝文士间的神交<sup>2</sup>，清朝大家翁方刚与秋史金正喜之间的师弟关系<sup>3</sup>等，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考察朝鲜金氏、洪氏两大家族与清朝文人之间的交流情况。

### 1) 清阴金尚宪与渔洋王士禛的交流

清阴金尚宪家族是朝鲜朝的名门望族，世代仰慕中原文化。关于金氏家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游关系，青庄馆李德懋有以下记述：

盖清阴先生，水路朝京，于济南，逢张御史延登，后七十余年癸巳，曾孙稼斋入燕，逢杨澄证交，望见李容村光地。后二十有八年，清阴先生玄孙潜斋益谦日进入燕，逢豸青山人李锴铁君，相与啸咤慷慨于燕台之侧。后二十有六年，清阴先生五代祖孙养虚堂在行平仲，逢浙杭名士陆飞起潜·严诚力谄·潘庭筠香祖，握手投契，淋漓跌宕，为天下盛事。自清阴以来，百有四五十年，金氏文献，甲

<sup>1</sup> 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1990；金柄民，《韩国近代移行期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5；郑日男，《朴齐家的诗论与诗》，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博士论文，2001；李岩，《中国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韩梅，《朝鲜后期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受容样相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博士论文，2002；徐东日，《李德懋文学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3；李学堂，《李德懋文学批评研究》，成均馆大学校博士论文，2004。

<sup>2</sup> 参考崔博光〈朝鲜后期“四家”与清朝考证学--以落花生的传来为中心〉，《韩国学报》第28期，1998。

<sup>3</sup> 参考李澈熙，《秋史金正喜诗论研究》，成均馆大学校博士论文，2001。

於东方者，未必不由於世好中原，开拓闻见，遗风余音，至今未泯也。”<sup>4</sup>

明朝末年，清阴金尚宪由水路从山东登岸后上京，途经济南，与御史张延登一家结下文缘。二人相见恨晚，张特地为清阴序刻了《朝天录》一卷。清阴之曾孙兄弟六人中，梦窝金昌集（1648～1722）、农岩金昌协（1651～1708）、三渊金昌翁（1653～1722）、稼斋金昌业（1658～1721）文名最著，其中金昌业曾著《燕行日记》。而金氏兄弟的《金氏联芳集》得浙士宁水杨澄的序和评论而归，更是扬名中原和朝鲜。在这次燕行中，金昌业与清朝名儒李光地的见面更是一件大事。与中原文坛的交游在金氏家族代代延续，清阴玄孙金益谦和金日进与豸青山人李锴铁，五代孙金在行与浙杭名士陆飞、严诚、潘庭筠分别续写了这种传统的异国文缘，成为两国间文化交流的一段百年佳话。

而张延登是渔洋王士禛妻祖，王士禛因此亦格外珍惜与朝鲜文坛的这段因缘<sup>5</sup>，此段关系李德懋也另有记述<sup>6</sup>。张延登与清阴金尚宪的异国文交，对‘神韵说’倡导者渔洋王士禛了解朝鲜文坛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名重当代的王士禛对金尚宪的诗颇为推重，并在评论其诗学成就的论诗绝句中加以引用。

淡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sup>7</sup>

绝句中的前两句引用的是金尚宪的诗句，王士禛在引用时对原诗的词句做了进一步的推敲和润色，将金尚宪诗中的‘轻雨’改为‘微雨’，将‘佳菊衰兰’改为‘菊秀兰衰’。由此可以看出，金尚宪的诗给王士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朝学者对朝鲜文人如此推重，朝鲜文坛也对王士禛好感倍增。李德懋认真研读了王士禛的文集和诗集，尤其是重点研究了《池北偶谈》和《感旧集》，对王士禛在两集中引用的清阴金尚宪的诗，又对照《清阴文集》加以考证，并专门考较了康熙年间赴朝使臣采编的《朝鲜采风录》。对于金氏后人养虚堂金在行与清末文士严诚、潘庭筠的交流，李德懋也做了详细的记录。

<sup>4</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35，《清脾录》，53 页，“农岩三渊慕中国”。

<sup>5</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34，《清脾录》，‘王阮亭’，47～48 页。“贻上（王士禛的字--笔者）先室张氏，邹平人，江南镇江府推官万钟之女，都察院御史谥忠定公延登之孙。崇祯末，金清阴先生，航海朝京，道出济南。时张御‘罢官家食，先‘因万钟得谒，御史一见倾倒，序刻其《朝天录》一卷，故贻上每表章先生。”

<sup>6</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63，《天涯知己书》，129 页。“张延登，齐人，明之宰相。而王阮亭士禛之妻祖也。清阴先生，水路朝京时，与张甚好，张为刻《朝天录》而序之，清阴集亦载之。阮亭《池北偶谈》，详言之。且抄载清阴佳句数十，盛言格品之矣。阮亭又晚年，辑明末清初故老诗，为《感旧集》八卷，起虞山钱谦益，止其兄考工郎王士禄，清阴诗亦入。”

<sup>7</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34，《清脾录》，‘王阮亭’，47～48 页。“（王士禛）尝著论诗绝句，历言古来诗人卅余首，而其论先生曰：‘淡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其首两句，盖先生诗，而考集中所载，微雨，作轻雨，菊秀兰衰，作佳菊衰兰者，独少异也。夫贻上之于诗，一言足以轻重天下士，而嘉赏先生如此之多，则先生之风流文采，亦可以想见于后世矣。”

贻上所撰《池北偶谈》，略记《朝鲜采风录》中诗，《采风录》者，康熙戊午，命一等侍卫狼曠使朝鲜，因令采东国诗。吴人孙致弥愷士为副，撰《朝鲜采风录》。贻上送孙愷士南归诗云：‘啣命扶桑外，曾归万里船。春潮浮鸭绿，古道出黏蝉。诗备輶轩采，名从万国传。暂须还倬直，未可恋青毡。’录中特抄先生诗，载《偶谈》。如：“... 齐唱竹枝联袂过，满城明月似扬州。”之类，皆其所谓清婉可诵者也。尝仿元裕之中州集例，编《感旧集》八卷，亦收先生诗。丙戌谢恩使到燕，行中适有先生旁孙名在行，遇钱塘严诚·潘庭筠，先问贵国知有金尚宪否，遂以实对。潘感慨久之，赠其筐中所携《感旧集》一部。又次先生韵，临别相赠。在行亦赠诗，严大加叹赏曰：此诗虽使王渔洋见之，不知其如何击节也。<sup>8</sup>

王士禛作为康熙朝‘一言足以轻重天下士’的文坛泰斗，从朝鲜文人清阴金尚宪的身上，不仅了解了朝鲜的‘声诗’，而且在论诗绝句中大加赞赏。他在阅读《朝鲜采风录》时，当读到清阴‘清婉可诵’的一篇篇诗歌时，一种又见故人的感动和喜悦油然而生。因此，在自己的文集中，他才对清阴的诗特别地加以摘引。“春潮浮鸭绿，古道出黏蝉”，王士禛透过采自于朝鲜，浸透着浓郁的异国泥土香气的诗篇，似乎听到了鸭绿江的滔滔春潮，看到了蝉鸣声声的古道上头裹儒巾，以悠扬顿挫的声调郎声吟唱着动听诗篇的朝鲜文人。“诗备輶轩采，名从万国传”，随着采诗使臣的脚步，王士禛感受到了两国文化的同源异地以及两国文人亲密无间的友谊。

## 2) 丰山洪氏家族与纪晓岚家族的交往

朝鲜后期与中国文坛有密切联系，并持续百年之久的另一家族，叫做丰山洪氏家族。丰山洪氏出身安东丰山，自高丽时迁居王京，成为京门望族。洪氏家族中，以使臣身份燕行，是从1647年洪柱元以当朝附马身份作为谢恩正使被派遣开始的，从此以后，洪氏家族成员几乎参与了朝鲜王朝此后的所有燕行使团，一直到1850年，根据史料统计，前后共计35人次<sup>9</sup>。

丰山洪氏家族与安东金氏家族，亦有很深的学缘关系。洪氏家族中以耳溪洪良浩、耳溪祖父芸窝洪重圣、耳溪孙子冠岩洪敬谟在朝鲜朝文名最盛，而芸窝正是金氏六昌中三渊金昌翁的弟子<sup>10</sup>。

洪氏家族在燕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与中国文士进行交流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以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撰官纪昀祖孙与洪良浩祖孙之间的交往，以及清朝陈氏

<sup>8</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34，〈清脾錄〉，‘王阮亭’，47~48页。

<sup>9</sup> 辛泳周，“18-19世纪洪良浩家的艺术享有与书艺批评”，《成均汉文学研究》第78辑。

<sup>10</sup> 洪良浩，《耳溪集》卷16，〈芸窝集跋〉。“府君早有志于文章，从三渊金公，闻诗道，治乐府古风。中岁以后，一准唐杜之轨，与赵后溪李槎川洪沧浪往来酬唱。……晚年，与名公长德结为耆社，每春秋令辰，选日置酒，韶颜华发，映照帘几，鸣琴赋诗，毫墨淋漓，文彩风流，为世所慕，比之香山东洛盛事。”

祖孙与洪氏家门尤其是洪敬谟的交往最为著名。

洪良浩初次燕行（1782年）时，结识了清朝翰林修撰戴衢亨，虽然并未与纪昀会面，但显然后来戴衢亨将洪良浩的文名介绍给了纪昀。因此，当洪良浩第二次燕行（1794年）时，纪昀已经对洪良浩有所了解。虽然两人有直接结识的机会，而且也见了面，但并未能够直接对话，而是通过纪昀随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才结下这段千古文缘的。

初入燕京，翰林修撰戴衢亨闻名，求见诗笔，乃书示纪行诗二篇。衢亨大加推诿曰：“诗则清道老健，笔则大类李北海。”赠以古诗长篇，乃以文房为贽。是行衢亨适以学政出外，中朝无知面者，及领赏于午门，礼部尚书纪昀，颁赏来，相去稍远，无以交话，以时注目。及退出，遣象胥致款曰：“久仰高名，交臂而失之，殆有数焉。今闻令郎学士随来，求与相见。”乃遣乐浚造门。纪公步出中门而迎之，延至上座曰：“夙慕尊大人盛名，今也望见而不得接语，可恨。”因求见诗文，以宿稿二卷赠之。纪公大赏之。各著诗文序，使其门人将诗书而遗之。……又以长书，请与定交。可谓海内知音也。<sup>11</sup>

洪良浩第二次燕行的身份是谢恩及三节年贡正使，当时在午门颁赏，与纪昀既然相距稍远，则当时清朝方面负责颁赏的必然是另有其人，不然的话应该有直接对话的机会。而两人‘以时注目’，说明事前通过戴衢亨的牵线搭桥，双方已互知文名，只是正式场合下，又碍于洪良浩的外交使节身份，苦于无直接对话的机会而已。因此，纪昀只好约请洪的公子洪乐浚来自己家中代父相见。纪昀“步出中门而迎之”，对洪乐浚的礼遇，以纪的身份，应是出于对其父洪良浩的特殊尊敬。

从洪良浩初次燕行与戴衢亨“定交”，而与纪昀互相知名，到这次双方互赠诗文集的序并“定交”，期间相隔12年（1782~1794）之久<sup>12</sup>。作为清朝第一学者，纪昀十分主动地要求与洪良浩定私人之交，可见他对代表朝鲜文学成就高峰的洪良浩十分之看重。而洪良浩对此也引以为荣，引纪昀为“海内知音”。

然而，尽管洪良浩的诗学成就倍受清朝学者纪昀的肯定，但在当时的朝鲜文坛却并未受到重视，因此，他似乎只能在对自己诗文孤芳自赏的同时，更加以受到纪昀的肯定而自傲，对与纪昀的海内神交更加怀念。

府君病中，为文自序曰：“可谓神笔也。”篇末眷眷于与中国人托契者。盖世无深知者，而慨然求海内知音也<sup>13</sup>。

<sup>11</sup> 洪良浩，《耳溪集》，〈太史是自序〉。

<sup>12</sup> 关于洪良浩与纪昀的交游，洪敬谟后来也作了以下记录：“先王考耳溪公，尝再奉使入燕，与纪晓岚先生、梁德圃尚书、戴莲士修撰游”（洪敬谟，《耘石外史》续编，〈玉士先生惠览〉）。但对照上引洪良浩自己的记录，二次燕行时，莲士戴衢亨“适以学政出外”，因此导致“中朝无知面者”，看来洪敬谟的记录显然有误。

<sup>13</sup> 洪敬谟，〈本生先府君自序文附录〉。

洪良浩对纪昀的托契之情，洋洋洒洒于书信之中，而千里之外的纪昀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真挚的情感。1797年1月，收到异国鸿雁传书的纪昀将洪良浩的来信装裱成册，与洪的诗集一并交与孙辈中的佼佼者纪树蓁珍藏，他所期待的是前辈之间的异国奇缘能永远铭记在孙辈心中，其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前两接手书，俱已装潢成轴，付小孙树蓁成貯。兹拜读华藻，亦并付珍弄。此孙尚能读书，俾知两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将来佳话也。兹因郑同知归韶之便，附上水蛙砚一方，上有拙铭。白玛瑙搔背一件，郎窑（康熙中御窑，今百年矣）一件，葛云瞻茶注一件（宜兴之名工），各系一小诗。先生置之几右，时一摩挲，亦足关远想也。<sup>14</sup>

在收到纪昀的上述来信和礼物以后，洪良浩深感盛情，马上回信：

……至于文房各种，个个珍美，盥手爱玩，益感中心之贶也。五绝诸篇，韵格逼古，壮诵不已。况教以前后拙笔付诸令孙，使之藏篋而传家，此何等至意盛眷也。贱孙祖荣，年方弱冠，粗解文墨，亦使此儿，擎收盛蹟，以修永世之好也<sup>15</sup>。

从信的内容来看，洪良浩确实领悟了纪昀要将两人的友谊传给下一代的愿望，因为原先在燕京两人交往开始时的定交，就是由洪的儿子洪乐浚登门拜访纪昀完成的，因此两家实际上早已是通家之好。这次洪良浩又特意将孙子冠岩洪敬谟介绍给了纪昀。二人结成‘永世之好’的美意显然被孙辈们承接下来了。洪敬谟后来记述道：

文献公于晚年，托契于晓岚纪公，每凭节使之行，书以寄信，诗以道情，而纪公亦如之。其书有曰：“异地之同调”。又曰：“旷世之奇遇”。信乎易所谓同气相求者也。余既收弄往复书牋及诗章，汇成《斗南神交集》；又收手书诗文之副本装裱成帖，俾使后人知两老人如是之神交，作将来佳话也。<sup>16</sup>

洪敬谟的这个序显然是在洪良浩去世（1802年）以后写的。出于对祖父与清国人士的‘异地同调’、‘旷世奇遇’的敬意，他郑重地将两人的往复书信及赠诗整理成书，并将副本装裱成册，以期流芳百世。在洪良浩去世以后，其子洪羲浚通过洪敬谟将洪良浩的遗稿抄录和自己的著作转交给了纪昀之孙纪树蓁：

<sup>14</sup> 洪良浩，《耳溪集》，〈与纪尚书书附答书〉。

<sup>15</sup> 洪良浩，《耳溪集》，〈与纪尚书书〉。

<sup>16</sup> 洪敬谟，《耘石外史》后编〈斗南神交帖〉。

家大人耳溪遗稿抄录为四卷以呈，而仆之所著大贯二卷、兀文四卷、玩易大旨一卷，亦为付送，以质得失于高明之见耳。兹因从子之行，遥寄尺素，庸叙阻怀，惟希雅照。<sup>17</sup>

洪羲浚曾在1826年以使节身份燕行，而洪敬谟的燕行共有二次（1830年，1834年），二人每次燕行想必都会将与纪家的通谊作为公务之余的大事。

洪良浩与纪昀双方的交流，并不局限于一般的诗书交流和款叙衷情，而是不断地切磋学术，互相启发。当时的朝鲜已经通过清朝和日本，对西洋的文物如天主教堂等有所了解。但对西洋的科学仪器、地理、历史、制度等所知甚少。为此，洪良浩专门写信给纪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惟其测向仪器，极精且巧，殆非人工所及，可谓技艺之几于神者也。……至若水土火气之说，不用洪范五行。而伏羲八卦，无所凑泊，噫其怪矣。……其言皆有依据，则不可以异教而废之。……其国史记，或有入中国者？而规模法制，果何如也？……永乐时，郑和遍游绝海，闻尝到西国之境云，其纪行之书，必有印传于中国者，愿得一寓目焉。……名物度数之至颐至广者，圣人亦有所不及知者，置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可也。<sup>18</sup>

纪昀收到信后，马上抄录了西洋书籍的存目中列入《四库全书》的几篇，寄给了洪良浩。象这种通过与清朝学者交流获得的学问，在洪氏家族中也形成了一种家学的气氛，而得以广泛传播。这对朝鲜后期新的朝鲜观、中国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透过金氏家族与张延登、王士禛的交流以及洪良浩与纪昀的交流关系，不难看出两国间文学的交流是建立在文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真挚感情的基础上的，这种交流不但丝毫没有因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障碍而逊色，反而更加感人至深，而且持续时间长久。中原文士张延登、王士禛以及纪昀对朝鲜文人诗文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同时也反映了两国文人之间在人生观与审美观上的共同取向。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代表了中原文化与朝鲜文化之间的文化交融。两国文化的共同性让两国文人都体会了一种文化认同的感动。

### 3、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

如前所述，朝鲜后期中韩文人进行了多层次经常性的交流，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佳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不和谐的因素。在交往过程中，由于对对方的民族性以及历史、文化、语言等缺乏了解，往往导致一些文化误读现象，而这种因为缺乏沟

<sup>17</sup> 洪羲浚，《传旧》，〈与纪茂林树蕤书〉。

<sup>18</sup> 洪良浩，《耳溪集》，〈与纪尚书书·别幅〉。



通而造成的文化误读，又直接影响到了双方正常的文化交流。这其中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先天性因素，如语言不同造成的沟通上的困难和诗歌创造方面的韵律不一致等等。

从朝鲜后期文集和燕行录资料来看，由于中国历代文人对朝鲜的情况了解不深，在刊行物中，经常出现一些令朝鲜文人瞠目结舌的错误。对此，李德懋在写给清朝文士雨村李调元的信中指出：

朱蒙，卽高句驪始祖高氏之名也。今先生詩曰：寄語朱蒙蟬橋老，先生應以朱蒙爲國號，此甚踈謬，改以朝鮮，未知如何。大抵中國之書，於海外之事，每患紕謬。列朝詩集、明詩綜、東國小傳，考證非不該洽，而亦多顛錯，勢所固然。先生之學，地負海涵，著書汗牛，搜討極博，若及東國故蹟，質問於不佞，則可以一正從前之僞舛，其於東方，榮亦大矣。先生其圖之。<sup>19</sup>

清朝文人雨村李调元与墨庄李鼎元兄弟与北学派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交游极深，书信往来频繁。其中李调元更是被李德懋引为知己<sup>20</sup>。蝉桥轩是李德懋的书房堂号，由于敬慕欧阳修和屈原，特地取欧的〈蝉赋〉与屈的〈橘颂〉合而一之而得名的<sup>21</sup>。李调元在写给李德懋的诗中，由于对朝鲜历史不熟悉，错将高句丽始祖朱蒙当成了国号地名，被李德懋不客气地指为‘踈缪’。

朝鲜各个朝代的文人学者都十分注意搜集中国刊行物中有关朝鲜的文章，只要发现，无不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李德懋列举的《列朝诗集》是清初钱谦益搜集中国明代诗编辑的诗集，分为正集和附录。其中附录部分收录了部分外夷诗并各加小传。而《明诗综》则是朱彝尊搜集了明洪武起到崇祯止，上自帝后，下到僧尼道流，近到宗亲，远到蕃服的诗编辑而成的100卷本诗集。在这两本出自同样重视考据的清初两大学者之手的诗集中，有关朝鲜的资料也错漏百出，这自然会引起朝鲜文人学者的不满。

当时中国学界对朝鲜文坛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有一则在朝鲜本来不很有名的诗人的诗，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中国，幸运地被朱彝尊的《明诗综》收录进去。对此，李德懋用“李广、雍齿，幸不幸也”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

“秋风黄叶落纷纷，主纻山高半没云。二十四桥鸣咽水，一年三度客中闻。”此

<sup>19</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19，〈雅亭遺稿，書〉，“李雨邨調元”，268页。

<sup>20</sup> 同上，267页。“不佞海外腐儒，天下陈人，数理之精，不如弹素，辨核之博，不如姜山，温润之姿，不如惠风，超迈之气，不如楚亭。不意如今蒙被宠光，举一逸字，蔽我平生。匪直一时之嘉奖，亦足为千载之公议... 先生料我于千里之外，置我于先民之列，品藻如鉴，一何神也。不暇搢谦，心甚自负。何者，君子之交，评而相信。长者之评，笃而匪伪也。从今以往，奉为知己。惟我先生，慎勿辞避。”

<sup>21</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4，〈嬰处文稿〉，“蟬橋軒銘并序”，87页。“余尝爱欧六一·屈左徒之为人，喜读其文，于欧取蝉赋，于屈取橘颂，窃有所感焉。”

诗宜平平耳。载于《明诗综》。李孝则不甚有名，而因一诗流传天下，亦幸人也。权应仁《松溪漫录》曰：“安东有一措大李孝则者，携鱼无迹同逾鸟岭，有一绝云云，鱼搁笔。（权说止此）以鱼君之才，见此搁笔，何也。挹翠轩朴闇诗，世推为东方杜甫，而钱谦益列朝诗，朱彝尊明诗综，蓝芳威朝鲜诗选，皆见漏，真李广·雍齿，幸不幸也。”<sup>22</sup>

措大在韩国古语中是‘清贫的儒生’的意思。可见，李孝则当时并无显赫身份，也不是著名诗人。鱼无迹则是朝鲜中期著名诗人，其〈斫梅赋〉、〈流民叹〉、〈新历叹〉等反映平民疾苦的优秀作品，载于《续东文选》、《国朝诗删》。从李德懋引用的上述李孝则的这首诗来看，实事实写，似乎过于平实直露，李德懋评价的‘平平’，是说这样的诗很难代表当时朝鲜诗的水平。在朝鲜中期，挹翠轩朴闇师法宋代陈师道的重技巧诗法，与李荇一起有‘海东之江西派’之称。诗的题材和形式多样而平实，因此在朝鲜诗坛评价很高。代表朝鲜诗歌水平的著名诗人的诗没有被中国文人选中，而被选中的却是象李孝则这样无名诗人的诗，这从朝鲜文学批评家的立场上，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是必然的。因此，他只能用‘幸不幸也’来发泄自己的感慨。

如果说朱彝尊选录李孝则诗的故事还能用选家见闻不广，或者审美观不同来解释的话，那么，下面钱谦益贬低金安国的例子更引起了朝鲜文坛的不满：

钱受之所云‘国内无戈坐一人’，即金慕斋作也，见本集。受之之跋《皇华集》，举此以讥之。然其华鸿山察，颁诏时所作俑也。如“广野无边水，长天一点鸿”，野字写得广，天字写得长，水字去傍为无边，鸿字打批为一点，此所谓二字含意也。故陪臣远接龙湾，必妙选词学之士为从事，以备应卒。而诏使在道，必出此等，意在困迫接伴。当时接伴诸人，亦必预习此等，遂以为例，而非所乐为也。受之为鸿山跋此集也，没其实状，而独拈东人一句，以为痴笑，至戒其勿与酬唱，恶能服东士之心乎？<sup>23</sup>

慕斋金安国（1478~1543）是朝鲜前期的著名文人学者。朴趾源查阅了《慕斋集》后，确认‘国内无戈坐一人’虽是金安国的诗句，但并不代表诗人的真正水平。这是为了应付前来颁诏的明朝来使，以拆字为诗的方式作成的应景之作。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清朝前期著名文人，钱谦益不问原委，拈出一句，硬说朝鲜人作诗水平如此之低下，中原人可不必与之酬唱，此种做法确实让自尊心很强的朝鲜文人难以心服。朴趾源甚至认为这是由于以钱谦益为党魁的东林党鄙夷朝鲜的缘故，所以才故意对朝鲜诗文横加抹杀，因而更加感到气愤和惋惜<sup>24</sup>。

<sup>22</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32，〈清脾录〉，5页。

<sup>23</sup> 朴趾源，《燕岩集》，〈热河日记·避暑录〉，281页。

<sup>24</sup> 朴趾源，《燕岩集》，〈热河日记·铜兰涉笔〉，317页。“东林一队不悦朝鲜，钱牧斋为东林党魁，则以鄙夷我东为晴论，可胜愤惋耶？至于东国诗文，则尤为抹杀。”

其实，中国从三百篇开始，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风雅的采集，包括对周边民族诗歌的采集。但往往因为资料难得以及资料缺乏权威性，而影响对外国诗歌的选别和评价。由此发生的问题，屡见不鲜。许兰雪轩就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兰雪轩许氏诗载《列朝诗集》及《明诗综》，或名或号，俱以景樊载录。余尝著《清脾录序》详辨之，懋官之在燕，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阆中东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轮赞许云。及余在此，论《诗综》阙谬，因及许氏。尹公曰：“尤悔庵侗《外国竹枝词》首著贵国，其曰‘杨花渡口杏花红，八道歌谣东国风。最忆飞琼女道士，上梁曾到广寒宫’。注云：‘闺秀许景樊，后为女道士，尝作广寒宫白玉楼上梁文。’”余详辨其景樊之诬，尹、奇两人俱为分录收藏，中州名士当又以此事为一番著书之资。大约闺中吟咏本非美事，而以外国一女子芳播中州，可谓显矣。然吾东妇人，未尝以名与字见於本国，则兰雪之号，一犹过矣，况乃认名景樊，在在见录，千载难洗，可不为有才思闺彦之炯鉴也哉！<sup>25</sup>

如前所述，凡在中国著作中涉及到的高丽和朝鲜的诗人作品，都会成为朝鲜文人的关注对象。而许兰雪轩更以一国外女流诗人的身份著名于中国典籍之中，这个事件本身就更具有议论的价值。而在朝鲜，许氏的二位兄长的名字更加著名，荷谷许葑、惺叟许筠都是朝鲜中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历史的原因，朝鲜朝社会一直对女流诗人作诗作画显示才气持反对态度，更何况兰雪轩以女流的身份闻名中原。朴趾源视为问题的部分不止这些，他还注意到对许氏之号的错误传播。实际上，在李德懋与朴趾源燕行中国之前，洪大容早在1765年燕行时，已经与清朝文士严诚、潘庭筠（字兰公）等对此有过交流。

兰公曰：“贵国景樊堂许葑之妹，以能诗名入中国选诗中，岂非幸欤。”湛轩曰：“此妇人，诗则高矣，其德行远不及其诗。其夫人金诚立，才貌不扬，乃有诗曰：“人间愿别金诚立，地下长从杜牧之。”即此可见其人。”兰公曰：“佳人伴拙夫，安得无怨。”

炯庵曰：尝闻景樊，非自号，乃浮薄人侵讥语也。湛轩亦未之辨耶。中国书，分许景樊兰雪轩为二人。且曰：“其夫死节於倭乱，许氏为女道士以终身。”其诬亦已甚矣。兰公若编诗话，载湛轩此语，岂非不幸之甚者乎。且其诗为钱受之柳如是指摘瑕类，无所不至，亦薄命也。<sup>26</sup>

引文的前半部分是潘庭筠与洪大容关于许兰雪轩的对话，后半部分是李德懋的评论。潘庭筠认为许氏以一女流之辈能够入选中国选诗集实为幸事。他在问话中错将兰雪轩的号称作景樊堂。而洪大容对这个错误未加理会，只是讲了许氏恃才而对婚姻不

<sup>25</sup> 朴趾源，《燕岩集》，〈热河日记·避暑录〉，278页。

<sup>26</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132页。

满的故事。李德懋在评论时，也与朴趾源一样，注意到对许氏堂号的错误引用。并认为这比“浮薄人侵讥语”更为严重，指出由于洪大容当场没有给予指正，如果潘庭筠“编诗话，载湛轩此语，岂非不幸之甚者乎”，以错将错，作为一个已经被“钱受之柳如是指摘瑕类，无所不至，亦薄命也”的女流诗人，在中国被诬传，岂非更加不幸。

在跨文化交流中，发生误读现象是正常的。避免误读是促进两种文化进行正常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有一种富于理解的心态，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同时本国学者也有必要主动地把本国文化准确地介绍给对方。李德懋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洪大容与清朝文人的笔谈内容时，就注意到了向中国介绍代表本国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学者。

湛轩曰：“我国文章，新罗有崔孤云，高丽有李奎报、李牧隐，本国朴挹翠轩、卢苏斋、崔简易、车五山、权石洲。”

炯庵曰：漏佔毕斋及三渊翁，可谓缺典。又别立门目，书金东峰、徐文康、李忠武、赵文烈数人，似好矣。<sup>27</sup>

洪大容在向清朝文人介绍本国人物时列举的确实是各个朝代的一些文学名家，但他只注意到了文学一个方面。李德懋则认为还应该介绍朝鲜更多的优秀人物，如主张儒道佛三教圆融思想的东峰金时习，代表朝鲜气哲学最高成就的文康公花谭徐敬德，代表朝鲜军事最高成就的兵家忠武公李舜臣，代表道学与节义的文烈公重峰赵宪等，以使本国的学术成就能够在中国得到承认和传播。

在洪大容燕行归来后的第二年，李德懋为此又专门给潘庭筠去信，介绍了代表朝鲜程朱理学成就的栗谷李珥<sup>28</sup>。另外他还认为应该在中国出版朝鲜学者的著作，增进中国文人对朝鲜学术的理解。

“如蓀谷集，流入中国。中国人但知蓀谷，而不知为李达耳，其诗列之亡名氏，此是孤陋之弊耳。且如退溪、栗谷诸先生文集，岂可局于一隅。只有名于东方数千里之内，独不使昭布天下，而人人知有此贤人也。此等集，若齎送中国，则必有好事者，精刻鲜装，布之天下矣。”<sup>29</sup>

尽管朝鲜学者积极推动在中国刊行朝鲜学者的著作，但实际上，除了朝鲜的部分诗集之外，朝鲜学者的著作却并没有更多地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我认为这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太少，沟通不够。尽管朝鲜每年都有学者随使节前往中国，但毕竟人数太少。而且接触到的中国文人也非常有限，大部分

<sup>27</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63，《天涯知己书》，132 页。

<sup>28</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19，《雅亭遗稿·书》，265 页。“我东栗谷先生李文成公珥资品顔曾，義理程朱。窃想先生已于湛轩熟闻之。此是东方圣人，而其学不表章于中国，诚为缺典，令人慨叹。尝湛轩年前，仰饋先生栗谷所著《圣学辑要》，先生何不开彰广布，以光儒学也？”

<sup>29</sup>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 48，《耳目心口書》，362 页。

中国文人并不了解朝鲜的情况。二是中国的少数文人通过和朝鲜文人的交流所获得的有关朝鲜文坛的信息不够全面，甚至缺乏权威性。三是不排除中国文人因为文化中心主义而具有轻视朝鲜学术的思想。

#### 4、结论

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即便是在交通、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着语言、文化等很多方面的障碍。而在17-18世纪的中国和朝鲜，两国文人却能够建立起密切的交流关系，并留下了许多曲折动人的传世佳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韩两国相似的文化背景在两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两国学者对儒家文化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在人生观、文学观、伦理观、世界观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使得两国文人很容易亲近，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第二，两国文人共同的交流工具——汉字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尽管两国文人的语言不通，但他们都可以使用汉字进行“笔谈”，这就大大方便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笔谈”还有利于准确记录他们所谈的内容，有利于建立长久的交流关系。第三，汉诗是中韩两国文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中韩两国的文人皆能文善诗，而中国自古就有“以诗会友”的传统。两国文人的相识和交流大多都是从诵读和评论对方的汉诗开始的，文人之间相互交流诗作成为他们日常交往的重要内容。第四，学术切磋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文人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中韩两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仅限于表面上的礼节性交往，而且涉及到了深层次的学术探讨，甚至批评和争论。

当然，两国文人的跨文化交流也无法避免地发生对对方文化的误读现象。但这些文化误读大多数都是由于缺乏沟通和了解而产生的无意识的误读。而且两国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消除两国文人之间的文化误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正是由于两国历代文人的积极努力，中韩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因为文化误读而引起的文化冲突现象。

（本文作者牛林杰系山东大学韩国学院教授，李学堂系山东大学韩国学院教授）